



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

牟钟鉴 著

《吕氏春秋》与
《淮南子》思想研究

齐 鲁 书 社

牟钟鉴 著

《吕氏春秋》与
《淮南子》思想研究

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

《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

牟钟鉴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10.875印张 5插页 232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统一书号： 2206·53

ISBN 7—5333—0026—2

B·12 定价：3.15元

出版前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灿烂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不仅哺育着中华民族的成长，也对人类历史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开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科学研究，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课题。《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即是适应时代要求编辑出版的一套学术研究系列专著，这套丛书重在思想与研究，学术价值，是它的生命。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在深层次、高水平上的展开，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规律的发现。并且通过编写实践，促进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壮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队伍。

从先秦到近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凡属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各种专题的学术研究著作，只要史料翔实，具有独到的观点与深刻、新颖的见解，均可辑入。

编辑这套丛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尊重和承认既有的研究成果，从现实出发去建立整套丛书的一定的系统，下列十个方面的著作将得到优先考虑：一、儒家思想及其在中国思想文化中

的地位的研究；二、学派研究；三、思潮研究；四、范畴研究；五、断代哲学、思想史研究；六、比较研究；七、地方文化思想史研究；八、典籍研究；九、问题研究；十、方法论研究。同一选题可以有数种不同路数的著作并行。

这套丛书计划出版一百种。每种都是一部独立的学术专著。每部著作十几至二十几万字（必要时也可达三五十万字）。从1987年开始，预计在不是很长的时间内完成。

《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实行主编负责制。由学者、专家组成的编委会对这套丛书的学术质量负责。编辑工作，实行委托编辑制，并由责任编委负责审稿、主编终审。

《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由齐鲁书社出版。

《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

编 辑 委 员 会

1987年3月30日

序 言

这部书稿的原稿写于数年之前，其中一部分内容曾经过压缩纳入集体著作《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任继愈主编）之中，最近我以原稿为基础，作了一些修正补充，并增补历代考评辑要作为附录，遂成目前这样一个面貌。我把这部书稿整理出版的动机，一则由于它所评述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两书，在秦汉思想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却远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两书之间的比较研究更为人所忽略，有感于怀，不畅不快；二则由于它是我心血的凝结，敝帚自珍，人所难免，而且其中很多内容未曾与读者见过面，拿出来或可给学术争鸣增添一份参考资料。现在学术发展日新月异，我自己的想法也常在变化，看往年文稿总能发现一些陈旧的地方，回观此稿亦有是感。我既为自己学术水平起点较低而羞愧，同时又为自己头脑不僵化、时有进步而庆幸。一部作品只要是下过一些笨功夫，即使不够成熟，不妨与社会见面，让学术界与广大读者加以品评，既可推动学术讨论，又可使作者早日听到时贤的真知灼见，以利于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这就是我鼓足勇气拿出这部书稿的缘由。

我把《吕氏春秋》研究与《淮南子》研究放在一部书中，是有意这样做的，其目的就是要以这样鲜明的方式向社会说明两书之间有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以期引起人们对两书比较研究的关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相距百余年，前者成书于秦统一中国的前夕，后者成书于西汉儒术独尊的前夕，二者之间的种种差异是明显易见的。然而两书之间无论在编写过程、结构方式还是思想内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经过认真的分析比较，我认定《淮南子》是以《吕氏春秋》为蓝本而写成的，它是《吕氏春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两书同属于道家思潮。因此，我把这两部书称之为秦汉之际道家著作的姊妹篇。关于两书的思想，书稿中已分别有详细的论述，这里着重联系秦汉之际儒道两大社会思潮，就两书之同异及价值，作一简要说明。

—

秦汉之际，好士养士的大贵族，无过于吕不韦和刘安。《史记》说吕不韦有门客三千人，于是造就了战国末年全国最大的学术中心。《汉书》说刘安广揽天下人才，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汉初最大的学术中心。一方面有大人物主持组织，另一方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学者参加，才会有《吕氏春秋》、《淮南子》这样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学术著作诞生。吕不韦和刘安写书的志向都很远大，都想凭借学界集体力量，给先秦诸子文化作一次系统全面的总结，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构造一个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以便为统一的

封建帝国提供较为完备的理论学说和治国方案。从编书的过程、方法看，两书都先有编写计划，然后由学者分头撰写，最后综合编纂成书，因此两书的结构规整，篇目统一。从思想内容看，都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历史、道德、军事等各重要领域，又兼采道、儒、阴阳、法、墨、兵等各家学说，而又能综合成一新的体系。《淮南子》的《时则训》基本上承袭《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纪首，只是改动了标示月份的方法，又将原五方配五帝、五神、五音等内容，移于《天文训》，“神”改为“佐”。《吕氏春秋·序意》提出“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根本指导思想，《淮南子·要略》则谓“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基本一致。这不是最明白无误的仿效和搬用吗！

尤其需要指出，两书的基本思想倾向一致，都推崇老庄哲学，并以其为主干，融合、贯串各家学说，从而形成一种综合性理论。这种理论的综合性，恰巧就是秦汉道家的特色，如司马谈所说，“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试看儒、墨、名、法诸家思想，对于形成两书的政治、经济、文化观点有重要影响，然而无一家成为全书的哲学理论基础。阴阳家的思想在《吕氏春秋》中建构了一种形式完备的世界图式，然而未能成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它在《淮南子》中的地位更有所下降。两书的宇宙观和认识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例如，“道”是两书宇宙发生论的基本概念。《吕氏春秋》将“道”（又称“一”或“太一”）看作宇宙始初状态，又表示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

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大乐》），“凡彼万形，得一后成”（《论人》）。《淮南子》有《原道训》，系统阐发老子的“道”，提出了历史上最系统的宇宙发生论。《吕氏春秋》从老子“无为”论中引申出“是法天地”和“因则无敌”的贵因论，作为社会行为的最高准则，全书的政治论、人生论及其他内容，处处体现“顺其自然之性”的基本思想，即贵因。《淮南子》也反复强调“因其自然而推之”的原则，并赋予贵因和无为以更多的积极进取的因素，这一原则亦是本书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基点。这些思想是两书的基础和核心，其他各种思想都围绕道家的自然论和贵因论而展开铺陈。此外，老子利害相生、以柔克刚的辩证法思想，重生轻利、避祸全身的养生论，也都是两书社会人生论的基调。

再看一下庄子的影响。《吕氏春秋》大量吸收《庄子》，主要有：万物本性不可变，“无为”在于使万物各安其性命之情，天道运行无所滞留，君无为臣有为，轻物重生等。《淮南子》对《庄子》的采摭更加广泛，主要有：顺性因民，人性和愉宁静，养生以养神为主，对生死问题应豁达明智等。仍然是尊重自然、承认差别、无为而治。

两书作者对老庄学派的评价高于其他诸子。《吕氏春秋·不二》谓“老聃（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以老为先。《有度》说：

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

所谓“通乎性命之情”，即老子的自然无为，《庄子》的不失万物性命之情，因其固然而然之。也就是合乎人情，顺乎民心。《吕氏春秋》认为这是治国之本，只有首先抓住这个根本，儒墨的仁义之道才能很好发挥作用，所以老庄与儒墨是内学与外学的关系。这一思想亦为《淮南子》所继承，而有先道德后仁义的治国方针。所谓“道德”在当时是道家关于事物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概念，不是后来儒家讲的伦理性的仁义道德。《本经训》认为“道德”是治世之本，仁义礼乐是圣道的陈迹。《览冥训》提出治国要“持以道德，辅以仁义”，也就是以道家为主，儒家为辅。在这些地方，两书都表现了秦汉道家的两大特色：一是理论上倚重老庄，二是内容上兼采百家。因此，两书除了崇尚老庄之学这一点相同，关于月令与政令相配，疾学尊师，法不可拘守亦不可无，法高于君，统一国家下实行分封制，治民以怀柔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等思想，也是相同的，是从儒、法、阴阳各家引发出来的。当然两书有高低、精粗之分，道家倾向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有由弱而强的趋势，所以我把《吕氏春秋》看作是秦汉道家的初创之作，《淮南子》则是秦汉道家的最高理论结晶。

学界对于《淮南子》是道家作品基本上无异义，但在《吕氏春秋》倾向哪家的问题上，则众说不一，迄无定论。不承认《吕氏春秋》是道家作品的学者，都把《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两书割裂开来，分别对待，忽略了两书之间的亲缘关系。其中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从根本上否认《吕氏春秋》成一家之言。如冯友兰先生就一向认为《吕氏春秋》是杂家，折衷拈凑，与《淮南子》不同。其二是在承认《吕氏春秋》有主导

思想的前提下各持一说。如《四库提要》说它“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清人卢文弨认为“《吕氏春秋》一书，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饰以儒术”；陈奇猷先生新著《吕氏春秋校释》则说“吕不韦的主导思想是阴阳家之学”，徐复观先生《两汉思想史》亦同此论。我在上面已经说明，《吕氏春秋》是具有道家色彩的综合家，有其条贯和取舍标准，基本上以道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言。《淮南子》亦是广采博取而归之于道。扬刘氏而抑吕氏难以说通。有的学者以吕书中宣扬宗法伦理为据，断定该书倾向儒家，似乎道家不该如此，岂不知秦汉道家已不同于老庄，不再排击儒学，转而明确肯定三纲五常的宗法制度与思想，只是秦汉道家在总体上崇道，不把宗法制度与伦理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先老庄而后六经。吕书恰是这样，前已有论。并且吕书中儒家思想的比重远不如《淮南子》大，而《淮南子》并不是儒家著作。认为阴阳五行思想是吕书的重心的学者，其根据之一是说阴阳学说被安排在全书首位，纪、览、论的首篇都是阴阳说，又篇章最多；根据之二是说吕书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非书中其他成分所可比拟。我以为这两点都需要商榷。诚然，阴阳五行说在吕书中占有显著地位，自身亦构成庞大理论框架，然而这个框架与多数篇章之间只有论题范围上的相应相属关系，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极少思想观点上的沟通。例如十二纪首篇为该月的月令，作者按春主生、夏主长、秋主收、冬主藏的特点，将四组论文（每组四篇）分别归属于四季之下，这四组论文在论题范围上相对地体现生、长、收、藏之义，然而各组论文如何讲生、长、收、藏，

从四季的特点上并不能直接推断出来，也就是说，十二纪所属各篇论文的具体论点并不受月令中阴阳五行思想的约束，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外在的。至于八览、六论，除了《应同》、《召类》数篇代表阴阳五行思想外，其余皆与阴阳五行无明显关联。可见阴阳五行学说在吕书中仍属局部现象，尚未来得及贯彻于全书，不具有支配地位。虽然如此，正是这一部分为汉代经学所重视，不断膨胀，把影响扩展到全社会，以至形成有汉一代以天人相感为特征的思维方式。不过，这是后来的事，不应逆向推断，得出阴阳五行说原本在吕书中起主导作用的错误结论。一书中次要成分后来比主要成分影响更大的情况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卢文昭关于吕书宗墨氏之学的说法也难成立。墨家思想在吕书中主要表现为主张爱利之道、尚贤、节葬、辩察等。《当染》大部分录自《墨子·所染》，更能证明吕书作者中有墨派人物。然而墨家思想最主要的特征——兼爱说，并不是吕书的主调，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主调还是道家的贵因说。吕书主张义兵说，与墨子的非攻说亦不相合。

比较合理的说法，还是将吕书归属于秦汉道家。东汉高诱距离《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时代较近，而且是两书较早的注作者，他的见解应为我们所尊重。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道家的“道德”是该书追求的最高目标，道家的“无为”是该书的纲领，其次才以儒家的“忠义”为伦理的准则，以法家的“公方”为行为的法规。这样，高诱就肯定了吕书倾向道家，并兼容儒法。高诱在《淮南子叙》中说，此书“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然

其大较，归之于道”。高诱认为《吕氏春秋》与《淮南子》都倾向于道家，只在评论分寸的掌握上有些差别。还有，高诱不象后来一些学者贬吕褒刘，他对两书都有很高的评价。高诱认为《吕氏春秋》可“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吕氏春秋序》）；又说《淮南子》“其义也著，其文也富”，“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淮南子叙》）。我以为高诱的见解是中肯的，比较合乎实际。

历史上亦有些学者看出《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有密切的先后继承关系，对两书作出一些比较分析。如汉末蔡邕说：“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蔡中郎集》）宋代高似孙说：“淮南王尚奇谋，募奇士，庐馆一开，天下雋绝驰骋之流，无不雷奋云集，蜂议横起，瓌诡作新，可谓一时杰出之作矣。及观《吕氏春秋》，则《淮南王书》殆出于此者乎？”（《子略》）近人蒋伯潜著《诸子通考》，谓：“《淮南子》成于门客之手，与《吕氏春秋》同”；“《汉书》本传曰：‘安好书，所招致率多浮杂。’故是书内容之杂，仍与《吕氏春秋》同”。可惜上述议论太简略，未能系统展开。而对两书作比较研究，不能停留在与两书直接相关的资料比较上，还应把它们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

二

《淮南子》成为《吕氏春秋》的续篇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战国中期以后，列国由角逐争雄走向政治的统一，与此同时，思想文化也在百家争鸣中加强了彼此间的渗透融合。这种文化融合趋势既受政治统一目标的推动，又在为政治统一的实现创造着思想条件。文化上的融合大致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固守本学派的门户色调和学术传统，在自己旗帜下容纳诸家异说，如荀子师法仲尼，标榜儒家，实际上是兼儒家而合名墨。《韩非子》、《墨经》皆属此类。另一种方式是跳出学派圈子，对各家学说进行综合整理和发挥。这种总结以往文化的方式，要有一种合适的文化环境，即各派学者云集，实行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从战国到秦汉，具备这种环境的时候有三次。第一次是战国中后期的齐国稷下学宫，集合了各诸侯国的大批学者，加上齐国自身的深厚文化积累，于是形成全国性学术中心，那里学术自由的空气较浓，而有《管子》一书的出现。今存《管子》一书编成时间较晚，各篇写作年代亦有前有后，但该书决非管仲亲著，多数篇章成于战国齐地，既有齐国管仲学派的作品又有稷下各国学者的作品。书中各家思想并行不悖：有对老庄哲学的“道”与“无为”思想的发挥，有对儒家礼乐仁义的论述，有对法家重法任刑的说明，有对阴阳家四时与五行相配思想的阐扬。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家们合力进行文化总结的初步尝试，所以内容上相当驳杂而少条理，但作者们欲将儒、法、道、阴阳各家学说融冶贯通的愿望则有明

白的表露。战国末年出现了《庄子·天下》篇，它从理论上肯定了兼容百家的必要性；认为各家皆“一曲之士”，有得有失，而道术应当是无所不包的统一大道。它所理想的为君之道是“内圣外王”，即能以老庄哲学修养和提高精神境界，又能以儒、法等家学说去处理治国兴邦的世事。《天下》一篇是秦汉道家杰出的先秦学术史论文，它代表了当时道家学者的一种想法，即：要想综合百家，必须以老庄哲学作为理论基础，因为老庄哲学及其“道”论，面向六合，贯穿天地人三才，能够超越各家各派的局限，从宇宙总体上考察问题，从事物深层的本质把握事物运动变化规律，视野开阔，眼光深邃，概括力和透视力较强，所以老庄哲学容易囊括其他诸子，而诸子均难以包容老庄。于是综合性文化思想就形成了以老庄哲学为主导，同时贯通百家的发展势头。

第二次就是在秦国吕不韦门下形成的学术中心里，出现了《吕氏春秋》。吕不韦的文化思想相当开明，他善于集中众人的智慧，又能有组织有计划地写书，所以《吕氏春秋》对先秦文化的吸收能力和改造能力都比《管子》大大提高了，具有了整体性、条理性 and 先进性。《吕氏春秋》强调文化要统一，“一则治，异则乱”（《不二》），但统一不是独尊，而是多种文化彼此的协调合作，所以它主张兼采众长，使各家的精华在统一的文化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叫做“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执一》）。这种指导思想本身就是属于道家的。《吕氏春秋》对先秦文化经过严格的筛选而后有所择收，它吸收的大都是先秦文化中生命力较强的优秀文化遗产。例如肯定老庄关于天道“自然无为”和入道“任物顺性”

的思想，抛舍其绝圣弃智、否定文明的消极成份，肯定儒家的宗法思想和重教尊师的思想，去其天命论和鬼神崇拜，肯定法家以法治国和随时变法的思想，去其峻法严刑和君主个人独裁的思想，肯定墨家兴利除害的便民思想和尚贤、节葬的主张，去其天志鬼神的思想。当然，它也继承了若干谬误，内容结构上有芜杂和矛盾的缺点，但总的说来，它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侧面的综合性文化学说，它的各部分之间基本上相协调。

第三次是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刘安治下成为学术中心，而有《淮南子》巨著的出现。如果说战国是百家争鸣，到秦统一中国则变为法家独行，再到汉初变为儒道两家争优比胜。文化上的融合继续按两种方式进行，但与先秦有所不同，除道家继续公开综合百家外，在一家旗帜下吸收别家的只剩下儒家。儒家学者以继承和发扬孔子与六经的事业为宗旨，对旧有文化进行整理、阐发与综合。这一工作发端于《易传》和《荀子》，汉初则有《三礼》、《尔雅》、《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易》、《书》、《诗》、《礼》、《春秋》都成为专门的学问，逐渐发展成经学。汉初儒学大不同于孔孟之学，在固守儒家的旗帜与“亲亲”的宗法思想条件下，对于儒学以外的各家，只要是有利于巩固封建秩序的，不论阴阳、名、法、道，还是别的子学，无不加以吸收。董仲舒号称大儒，而他的学说最驳杂不经，实际上他是用阴阳灾异说去充实改造早期儒学，故《汉书·五行志》说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初道家比吕不韦更重视老庄学说，故黄老之学盛行，不过黄老之学偏重于治国之道，而西汉道家并不一定都自称为“黄老”也。

不以老庄后学自居，他们往往持超然立场，明白宣示要博采众长，而同归于大道，事实上是以经过改造的老庄之学为基础的。司马谈所说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不可能是先秦排击儒墨的老庄之学，只能是秦汉道家。秦汉道家发展的顶峰，便是《淮南子》。

为什么刘安主编《淮南子》要直接继承和发扬百余年前《吕氏春秋》的基本思想呢？因为两书同处于一个大的思想文化时期，可以称之为统一的封建帝国确立统治思想的准备时期，它开始于战国末年，结束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这一时期思想家的基本任务是探索封建帝国长治久安之道，而时代向《吕氏春秋》作者提出的问题，到了刘安的时候仍未获解决，儒、道两大思想文化体系都在竞争文化领导权，都没有确立稳定的优势，政治家与思想家仍然处在探索之中。当初《吕氏春秋》提出了一套理论体系与治国方案，秦始皇没有采纳，而以法家治国，结果遭到失败。汉初执政者改宗道家，实行无为而治，适应了建国以后休养生息的需要，一度使道家比儒家占有优势。在唯法治国走不通，道家风行数十年并收到显著成效的形势下，作为上层贵族的刘安想到了具有道家色彩的《吕氏春秋》，试图在更高的水平上阐发《吕氏春秋》的思想，并希望中央政府推行《吕氏春秋》曾经提出的治国方案，是在情理之中的举动。事实上，由《吕氏春秋》提出并经《淮南子》进一步发展的封建治国之道，确实包含着能够稳定封建秩序的一般原则，如：在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主张君臣民各当其位，君主要任贤使能，循名责实，大臣要刚直不阿，公而不私；在实行法律法令的同时，要避免暴政苛法，适当照顾民众